

鄞县专业志丛书

鄞縣宗教志

國香題



陈定萼 编纂
团结出版社

序 一

浙江省人民政府宗教局局长 严紫娟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历史现象，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表现，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仍将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的政策，是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因此，研究宗教的历史和现状，探索宗教的发生、发展和兴衰的轨迹，编纂成专业志书，存史于世，资治于后，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鄞县宗教志》问世，便是为此作出努力的结果。

鄞县地处东南沿海，地灵物阜，交通便捷，经济繁荣，人才荟萃，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宗教在鄞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流传较早，影响广泛。佛教自西晋传入后，名寺如云，高僧迭出。阿育王寺以珍藏释迦牟尼佛舍利闻名遐迩，天童禅寺蜚声四海被日本佛教曹洞宗尊为祖庭，两寺皆为中国佛教名寺古刹。知礼、宗杲、密云、敬安、圆瑛一批高僧大德先后驻锡鄞地，或弘台宗，或演禅音，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光辉业绩。道教在鄞县千余年的流传史中，也曾有过宋元两代的兴盛。由于鄞县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瓷器之路”的起点，阿拉伯人、波斯人纷纷前往经商，使鄞城明州（今宁波市市区）成为穆斯林的聚居地之一。天主教、基督教是在鸦片战争后，凭依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在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传入我省，并以鄞县为传教中心向四方辐射。西方教会出于传教的目的，在鄞地兴办了不少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鄞县的发展。如此丰富的宗教历史，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鄞县宗教志》以科学的态度探索鄞县宗教发展源流，以求实精神纂述鄞县宗教历史事迹，为今后的宗教工作开展提供了一部资料书、历史书，也将为鄞县的宗教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促进鄞县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起积极的作用。

盛世修志。《鄞县宗教志》是在鄞县地方志修编工作全面开展中应运而生，既是新《鄞县志》属下的一部专业分志，也是我省第一部县市宗教专志。该志作者陈定萼同志，是鄞县人民政府宗教科科长，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忙里偷闲，不辞辛苦，广泛收集历史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鄞县宗教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后，经几年努力，数易其稿，终于编成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地方特色浓厚的《鄞县宗教志》，为世人留下了25万余字计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是值得赞扬和祝贺的。

《鄞县宗教志》的编纂和出版，得到了鄞县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是他们对宗教工作关心和重视的体现，藉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寄语我省各市县宗教工作部门，重视本地区宗教志的编纂工作，期待在明天，有更多更好的地方宗教志相继问世。

序 二

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华长慧

以文化之邦称誉的鄞县，素来有编纂方志的优良传统。据《浙江地方志考》记载，鄞县历代修成方志、专志达90多部。但在众多的志书中，却没有一部记述鄞县宗教的专志。今天，《鄞县宗教志》付梓出版，不但丰富了鄞县的志书宝库，而且为人们提供了详实的鄞县宗教史料。

《鄞县宗教志》是一部有浓厚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专业志书。它通过我国五种主要宗教，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鄞县的传入、发展和演变的记述，较全面地反映了鄞县的宗教历史和现状。该志以突出重点、体现特点为契机，对过去鄞县地方志书中关于宗教方面记述的不足和忽略之处，而却又十分重要的史实进行收集和增补。诸如鄞县的佛教与国外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名寺高僧在海内外佛教界的地位和声誉的记述；鄞县是浙江省基督教传入最早之县，成为基督教一些派别向全省乃至全国拓展传教工作基地的记述；各种宗教传入鄞县后，对全县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影响的记述等等，既“补史之缺、详史之略”，又揭示了鄞县的宗教在全国宗教史上占有的地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鄞县悠久的文明历史。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物，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

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则是它的表现形态而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在一部分人中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正确对待和外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宗教工作的长期性和重要性,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认真做好宗教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团结的稳定的社会环境。《鄞县宗教志》对今后宗教工作的开展必有裨益,它的现实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耕耘的季节是辛苦的,而收获的季节是喜悦的。陈定尊同志不但勤于工作,而且善于笔耕,经其数年辛勤編集,《鄞县宗教志》成为浙江省第一部县市宗教专志问世,特此表示热烈祝贺。

一九九三年十月

凡 例

一、《鄞县宗教志》由序言、概述、大事记以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5章、28节和附录组成。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鄞县宗教的历史与现状。

三、本志上溯至事物之开端，下限截止一九九零年底。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五、本志按各教设章，每章又设若干节，节以下视需要设目。各节内容交叉的记述有所侧重。

六、本志文体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在概述和各章首节中采用以叙为主，叙议结合方式；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

七、本志每章对各种宗教的形成及历史作适当的记述，旨在使读者对各教有个大体的了解，以便于阅览本志。

八、本志的历史记年，解放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志中所称的“解放后”系指1949年5月25日鄞县县城解放日之后。

九、本志数字书写：①表示数量，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数字，则用汉字；②百分比用阿拉伯字，几分之几用汉字；③旧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其中辛亥革命后的月、日用阿拉伯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

用阿拉伯字。

十、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取事年代的县境范围。凡发生在鄞县这块土地上的宗教史实，不论其当时冠何名（如明州、宁波），皆属本志记述内容。

十一、本志考虑到宗教的特殊性，必要时采用“越境而书”，以体现史实的联系性和完整性。

十二、本志收录的解放前有关章程，因原系直排版，故有“如左”、“左列”字样，即为今横排版“如下”、“下列”的含义。

十三、本志材料来自档案资料、正史、旧志、报刊、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目 录

序 言	1
凡 例	1
概 述	1
大 事 记	7
第一章 佛 教	31
第一节 历史沿革	31
第二节 宗派流传	37
第三节 仪轨制度	47
第四节 国际交往	56
第五节 寺院介绍	78
第六节 名僧小传	90
第七节 佛教团体	117
第八节 社会事业	137
第九节 天童、育王整修	147
第十节 寺志、碑碣、藏经	151
第十一节 中华佛教总会和中国佛教会	172
第二章 道 教	177
第一节 历史沿革	177
第二节 科仪戒律	180
第三节 道观(宫)变迁	187
第四节 鄞县道教会	193
第三章 伊斯兰教	197
第一节 历史沿革	197

第二节 清真寺概况	198
第四章 天主教	201
第一节 历史沿革	201
第二节 传入及发展	204
第三节 教堂与教徒	211
第四节 宗教教育	217
第五节 社会事业	220
第五章 基督教	225
第一节 历史沿革	225
第二节 教派活动	227
第三节 社会事业	281
第四节 宗教教育	310
第五节 三自爱国运动	313
第六节 三自爱国组织	333
附 录	339
一、备查文件目录	339
二、历届政协中宗教界委员	341
三、取缔反动组织“呼喊派”	344
四、1991年、1992年宗教年鉴	346
五、《鄞县宗教志》评审经过	354
编 后	356

概 述

鄞县地处浙江省东部,在东经 $120^{\circ}08'$ — $121^{\circ}54'$ 、北纬 $29^{\circ}37'$ — $29^{\circ}57'$ 之间,总面积1380.54平方公里,辖14镇又38个乡,总人口为69.6万人(1990年资料),分居在1826个自然村。现为宁波市辖五区、六县(市)中之一县。

宁波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今又是我国沿海十四个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而其前身是鄞县的县城。1949年5月鄞城解放,将县城析出置宁波市,从此鄞县成为全国少数没有县城(县政府驻地在宁波市区)的县份之一。

“鄞”是一个古老的地名,起源于夏朝。“夏有堇子国,以赤堇山为名……,加邑为鄞”(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自唐以来,县城为鄞州、明州、庆元府(路)、宁波府、会稽道等州、府、道治所的驻地。鄞县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成为浙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之宗教,在鄞县悠久的历史上,同样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我国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种主要宗教,伴随着鄞县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而流传、演变。

佛教在鄞县历史久长,影响深远,有“古鄞三佛地”之称。佛教传入鄞县始于西晋,僧慧达在太康三年(282)于鄮山得佛舍利,僧义兴在永康元年(300)结茅于太白山,开创了阿育王

寺和天童禅寺两大名刹之历史，时距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仅200余年时间。西晋时代的鄞县，僻居海滨，文化尚处草昧，而佛教先鞭传入，这是鄞县佛教史上的一个特点。宋代，天童禅寺和阿育王寺成为禅宗五山之一。各宗派涌出一批名僧，北宋时期的知礼，重振在发祥地天台山衰落的天台宗，使鄞县一度成为台宗中心；南宋时期，日本国僧人道元入明州参学，从曹洞宗第十三世、天童禅寺住持如净习禅，得法后回国创立了日本佛教曹洞宗，从此天童禅寺被日本曹洞宗尊为祖庭，在中日佛教友好交往史上增添了千秋传颂之一页；名僧大慧宗杲住持阿育王寺提倡看话禅与宏智正觉住持天童禅寺倡导默照禅，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极为久远；明季，高僧密云圆悟开法天童，弟子12人俱主诸山名刹，法雨遍被四方，被称为“临济中兴”；清代，天童禅寺与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常州天宁寺共称为禅宗四大丛林；天童禅寺方丈敬安改革住持继承制度，将十方传法丛林改为十方选贤丛林，这是丛林住持史上一次改革、一大进步。名寺众多，高僧迭出，闻名国内，蜚声海外，这是鄞县佛教史上又一个特点。民国初年，天童禅寺住持敬安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佛教团体——中华佛教总会并任会长；近代高僧圆瑛先后住持接待讲寺、七塔寺和天童禅寺，期间与太虚一起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并任主席，以后又连任七届会长或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又出任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中国佛教团体组织与鄞县的殊胜因缘，这是鄞县佛教史上第三个特点。

道教在鄞县流传千余年，自唐开元年间建立第一座道宫，历宋元两代的兴盛，经明清两代之式微，最终走向衰落、消失。

伊斯兰教随着对外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而传入鄞县。宋

代，在县城狮子桥一带有条称为“波斯巷”的街巷是阿拉伯、波斯人的集居地，在其附近便出现了鄞县第一座清真寺。但鄞县毕竟是汉民族集居地，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很少。

天主教于明末传入鄞县，清雍正禁教后一度销声匿迹。鸦片战争以后，又重新兴起、发展，后成为浙江代牧主教座堂的驻地。“光绪间，天主教最著名之大教士为赵保禄，宰割一府生灵而官方无力制止”（民国《鄞县通志》）。当时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着“道台一颗印，不如赵保禄一封信”之口语，可窥外国传教士在甬城所作所为之一斑。

基督教传入鄞县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其传入历史最短，而发展速度甚快。西方传教士凭藉帝国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取得了在中国的传教权，各基督教差会便接踵而至进入鄞县传教，各派传道布教扩展传教势力范围，全县先后出现了基督教大小教派14个。浙江省在全国各省中为基督教事业开创最早的省份之一，而鄞县是浙江省中基督教传入最早的县。美国的浸礼会、长老会，英国的圣公会是以鄞城为据点，向杭州、上海乃至全国拓展传教工作，这是鄞县基督教的一个特点。最早入鄞的基督教西方传教士，如浸礼会的玛高温、长老会的麦嘉缔都是医士，他们边行医边传教。以后各教会出自传教目的兴办了一些学校和医院，客观上给鄞县带来西方文明和文化。基督教会的学校办得早而且多，成为鄞县教育史上的特点之一。

解放以后，鄞县的宗教状况发生了变化。首先同全国一样，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结束了封建反动派势力控制和利用的历史。天主教和基督教清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割断了同外国教会的政治、经济联系，摆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教会的控制，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广大信教群众不但获得政

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且享受了宗教信仰的权利。其次，就群众信仰而言，佛教和基督教成为县内信教群众信仰的两个主要宗教；天主教（因县城析出置市，教徒人数大减）和伊斯兰教的信仰者较少；道教已经消失。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一贯政策。但自1957年以后，宗教工作中“左”的思想逐渐滋长，六十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发展。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胁迫教徒放弃宗教信仰。在这种形势下，全县境内的佛教寺院和基督教堂全部关闭，或被占用，或被拆毁，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逐步得到恢复，端正了宗教工作的方向。随着宗教政策的贯彻与落实，鄞县的爱国宗教组织相继建立，合理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1981年12月，设置了“鄞县人民政府宗教事务科”，处理日常宗教事务。现县内的爱国宗教组织有“鄞县佛教协会”和“鄞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鄞县基督教协会”。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所有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2座、县开放寺院1座；基督教堂8个、基督教活动点24处。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在县委的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下，由宗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负责管理。在县人民代表大会和县政协中，有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代表和委员，参与全县大事的讨论和协商。天童禅寺和阿育王寺既是佛教名刹又是游览胜地，成为鄞县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友好交往的一个重要窗口。

全县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做到爱国爱教，与全县人民一道，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 事 记

西晋太康三年(282)

阿育王寺开山祖师慧达得佛舍利于鄮山乌石岙结茅供养;佛教初传鄞县。

西晋永康元年(300)

天童禅寺开山义兴大师在太白山东谷建精舍。

东晋义熙元年(405)

阿育王寺迁移至鄮山南麓(即今寺址)建亭、塔、殿堂。

梁普通三年(522)

梁武帝赐“阿育王寺”额,由著名书法家萧子云书。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

日本沙门荣睿、普照从明州入唐求法。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

县治东南建成第一座道教宫(观)——开元宫。

唐天宝三年(744)

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日本，在舟山洋面被风浪所阻，得明州太守救援，安置在阿育王寺内，日僧荣睿、普照随同住阿育王寺。

唐至德二年(757)

天童禅寺迁徙太白峰下(即今寺址)。

唐贞元二十年(804)

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入唐八家”之一的最澄，乘日本遣唐使第二舶于九月到达明州，次年在开元寺法华院从灵光受“军荼利菩萨坛法”

后唐清泰二年(935)

鄞县僧人子麟往高丽、百济(今朝鲜)等国求天台教籍，受高丽国王接待，并遣使李仁日送子麟归。

北宋开宝元年(968)

到中国求法的高丽僧人宝云义通，应明州郡守钱惟治请留在鄞弘扬教观二十年，为天台宗第十六代祖。

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

县治东南首建清真寺。

北宋天禧四年(1020)

宋真宗特赐知礼“法智大师”号。知礼重振天台宗，被尊为天台宗第十七代祖，世称“四明尊者”、“四明大法师”。